

科学哲学的终结

——评布洛尔的科学知识社会学

周超

作者 周超, 武汉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武汉, 430072

关键词 科学哲学 科学知识社会学 强纲领

提要 1976年布洛尔出版的《知识和社会造型》(1991年再版)对科学知识作了社会学的考察,对科学哲学提出了全面的批评。他认为,科学知识本身并不存在绝对的先验本质,也不存在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观性等特殊本质。布洛尔把知识或信念看作一种自然现象,认为科学社会学是一门科学而不是一门哲学。他的科学知识的社会学有四个基本信条,即因果性、对等性、对称性、自反性。布洛尔从他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中得出了许多重要结论,其中有两项重要结论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成为80—90年代西方科学哲学领域的一个焦点。

逻辑经验主义瓦解之后,科学哲学领域出现了繁荣气象,哲学家们从科学史、社会学、心理学、解释学等诸方面对科学知识的性质、科学知识的形成、科学理论的发展方式作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各种学派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各种关于科学知识的理论如大江风起,一浪接一浪。其中就有布洛尔(David Bloor)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围绕这个强纲领形成了爱丁堡学派。布洛尔的《知识和社会造型》^①对科学知识作了社会学的考察,提出了关于科学知识的新问题和新见解。多数科学哲学家致力于科学合理性规范,并把这个任务看成哲学的特殊任务。他们力图通过阐明真理、实在等概念来说明科学的合理性。他们认为,知识是信念与事物之间的一种关系,或者是信念与证据之间的一种关系,或者是信念系统内部的一种关系。这种科学哲学观基本上为科学社会学家所接受。许多社会学家认为,知识的性质(真假)不受外部的社会环境的制约,知识社会学不能研究和解释科学知识的内容和性质。

在《知识与社会造型》中,布洛尔提出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他认为,科学知识本身并不存在绝对的先验本质,也不存在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观性等特殊本质。所有知识,不管是经验科学中的知识还是数学中的知识,都将被完全作为社会学研究的资料来处理。布洛尔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得出的两个重要结论是:第一,由于不存在上一级的或先验合理性、客观性、有效性标准,以建立和提供这些标准为核心的哲学是科学的累赘,多数

时候对于科学不仅无益,反而有害。第二,“真”和“假”等是一定的社会利益和社会制度的产物。

强纲领的主要立场是,在说明为什么某人或某群体持有某个具体信念、为什么某一信念发生转变这个过程中,那些信念是真还是假、是有道理还是没道理等考虑是无关紧要的。布洛尔的强纲领有四个信条:(1)因果性。对信念和信念变化的说明是因果说明,这要求我们考虑导致信念或知识状态形成的条件是什么。信念形成的原因有社会原因,也有其他原因。(2)对等性。我们常常拿合理与不合理、真和假、成功和失败来评价我们的信念或知识,科学社会学必然对它们作出对等的说明。(3)对称性。科学社会学的说明必须是对称的,比如说,同一种原因要既能说明真信念,又能说明假信念。(4)自反性。科学社会学必然是自反的,它的说明模式必须适用于它自己。否则,科学社会学将是对自己的反驳。布洛尔比较接近自然主义的哲学家,他把信念看成一种自然现象,他的计划对信念作出因果说明,就象物理学说明运动现象一样。但是,他的知识社会学研究的结论却在哲学领域引起了轩然大波。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导致工具合理性逐渐取代规范的合理性。与实证主义的、历史主义的、波普主义的、实在论的科学哲学不同,布洛尔和爱丁堡学派关心对科学家的活动作经验解释,而不属于科学合理性的规范解释。他们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道路,试图把哲学家喜爱的规范搁在一边而又能对科学作出说明,这个领域现在叫做“科学和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TS)。一般认为,STS在学术上是围绕着社会学进行的,但不可能脱离哲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最初的爱丁堡学派就是如此。在布洛尔的影响下,STS研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与普通的科学社会学不同,STS学者以分析的分离和认识的中立精神来研究科学。这就是说,他们尽可能使他们的方法符合“置身事外”精神。不过,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关于STS应采取什么态度对待科学,成了争论的焦点。

STS使那些关心科学合理性和实在论的哲学家很不满意,因此受到许多批评。但是,这个领域取得了许多的成功,这就迫使哲学家们考虑:如果不提供关于科学合理性的规范说明,会受到什么重大的损失?现在回答“损失不多”的科学哲学家越来越多了。吉厄(R. Giere)是这个倾向的代表^②。吉厄不太信服布洛尔的论证,同时又承认,布洛尔的哲学敌手没能证明在实际的科学实践之外有一个单独的“科学合理性”领域。吉厄用“工具合理性”一词来说明科学中的认识的成功,这个概念也是布洛尔的知识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这样,吉厄和布洛尔就联起手来了。吉厄说,不论过去是一些什么样的策略产生了认识论上可向往的结果,这些策略应该在将来配用到相似的场合中,这样就隐蔽地承认了这些关于研究目标的策略在具体场境中的相对性。布洛尔的强纲领的追随者巴恩斯(Barry Barnes)则使用了一个更有刺激性的词,即“自然合理性”^③,它与“工具合理性”的意思差不多。不管叫工具合理性还是叫自然合理性,科学所需要的合理性似乎不过如此。

另一方面,布洛尔的强纲领导致科学哲学的方向发生变化。哲学以什么方式来解释科学,现在成了一个重要问题。传统的科学哲学认为,理解科学的最适当的手段是对科学理论作逻辑的和概念的分析,甚至像库恩这样的反传统的哲学家也大致上是这样解释科学的。自然,多数哲学家不愿意改变这种解释科学的方式。他们力图说明科学哲学与STS有实质的区别。布洛尔和爱丁堡学派并不否认这种区别,却认为与STS有区别的科学哲学并无存在的理由。

病因是“认识论自然化”的开拓者。一般认为,自然主义在心理学上持还原论立场。例

如,“我相信玫瑰都是红色。”这里涉及一个认识概念,即“信念”。信念作为一种心理状态,并不是一个实在的事件,我们可把它还原为一种经验的相互关系,即神经状态(事件、过程)和具体的环境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信念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上,现代认识论和心理物理学站在一边,而知识社会学却站在对立的另一边。按照现代认识论和心理物理学的图画,孤独的有机体与它的环境(包括其他类似的有机体)相互作用。但是,知识社会学家怀疑这幅图。这种冲突在心理学中也有表现。例如,弗多尔(Jerry Fodor)和吉布森(J. J. Gibson)之间有一场关于“唯我论的”和“生态学的”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相对优点的争论。弗多尔论证说,专注于孤独的认识者具有实验心理学的方法论力量,因为它使心理学家达到思想的规律,本质上求助于思想之外的对象,因此,心理学承认“方法论的唯我论”^④。

曼海姆(Karl Mannheim)是知识社会学的建立者,以他为中介,可以很好地理解布洛尔。曼海姆所建立的知识社会学不同于科学哲学家所熟悉的自然化认识论。为了了解这种区别,考虑人们提出的有哲学意义的“知识问题”的两种策略。

策略 A (1) 我最了解我的心灵,但它可能不存在。(2) 那么,我如何判定其他可能的事物是否存在呢?如果它们存在,由于它们似乎与我自己的心灵不同,我如何认识它们?

策略 B (1) 我们日常感觉到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生活在同一世界,然而,当我们编排(articulate)他们的经验时,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能够直接到达的世界的外观中有着显著的差异。(2) 那么是什么使我们达到我们共同的实在有这些差异呢?是什么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忽视这些差异,认为我们自己达到的与所有的人都一样呢?

罗蒂、笛卡尔、蒯因等采取了策略 A,由内到外提出知识问题。而知识社会学则采取了策略 B,由外到内说明知识。布洛尔也采取策略 B,同曼海姆相似,布洛尔是一个认识论的实在论者,并相信他研究的多数人也是实在论者,因此他不相信预设实在论有助于说明各人信念的差异。有些哲学家担心,知识社会学的“相对主义”意味着反实在论、怀疑论、虚无主义或更坏的东西。针对这些哲学家,巴恩斯和布洛尔说,“总的结论是,在所有大不相同的认识反应中,实在毕竟是一个共同的因素。作为一个共同因素,用它来说明那些差异,没有什么前途。”^⑤因此,相对主义提出来,是作为某些可能与实在论相伴随的不良认识习惯的补充,特别是当一阶“自然态度”的实在论被捏造成二阶的普遍研究原则的时候^⑥。这些不良习惯有两个倾向比较突出:(1) 弱化(minimize)不同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信念的差异;(2) 别人与我们的信念有差异,如果这种差异不能完全解释透,就夸大这些人的病态。在强纲领的四个著名信条中,布洛尔表达了他认可的相对主义。这四个信条是:因果性、公平性、对称性、自反性。不幸的是,由于这几条被称作“信条”,批判者把它们当作无条件的认识论原则,而不是用于反抗某些偏向的启发法,研究异族文化知识的研究者一般都会有这样的偏向。

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一旦自然化会怎样呢?可以预料,布洛尔会同我们更一般的自然主义者分手。布洛尔和曼海姆对于自然化前景有共同的估计,而这估计是布洛尔在科学哲学中受到抵制的主要原因。自然化前景有三种:(1) 哲学增加它相对于具体科学的优越性和独特性;(2) 哲学相对于具体科学失去其优越性但保留了它的独特性;(3) 哲学相对于具体科学失去其优越性,也失去其独特性。

前景 (1) 很难受到赞赏,甚至很少讨论,因为这意味着自然化的哲学将会同科学作对。然而,假定自然主义者试图在认识上推进科学,那么这种动机有什么根据呢?在通俗的和社

会学的文献中充满了“信息爆炸”的感慨。现在是谁站在争端之上俯视相竞争的领域的相对优点?理想地说,是一个对于各门具体专业的进展没有利害关系的人,这个人能是一个哲学家吗?也许,如果哲学失去特有的题材,如果没有特有的题材不被看作弱点,而被看作优点:在对立的学科之间作调停,那么俯视具体争端的人就很有可能是哲学家了。哲学家对这样的结论并不感怀,这是因为它要求设制一些超越研究者本人的局部学科标准的研究评价标准,这种事情现在哲学家越来越不愿作了。现在比较前景(2)和(3),布洛尔看好前景(3)。

在蒯因(Quine 1985)吉厄(Giere 1989)福勒(Fuller 1992)的近作^⑦中可以看到,关于自然化认识论者或科学哲学家的职责,反复出现的比喻是“知识工程师”、“科学政策家”(science policymaker)这两个比喻都保留了哲学工作的规范特性,但没有传统哲学对立法的那种无限制、无条件的态度。简单地说,自然化的认识论是应用科学的一个分支,它只发布假说式的,而不是关于研究行动的绝对命令。因此哲学对于具体科学仍然是独特的(如果不是优越的),这是前景(2)。按这个前景,哲学不优于(可能劣于)当前最好的科学。

现在转向前景(3)。A和B两种策略对它的解释有实质性的差异。罗蒂和屈奇兰(P. Churchland)采取策略A,他们的自然化的认识论主张取消关于认识的哲学理论,代之以心理物理学理论。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哲学特有的东西”留下来,因为哲学只不过是原始的科学罢了。布洛尔也同意开除哲学——它既不是科学,也没有独特的题材。但是,布洛尔采取了不同的作法,提供了不同的理由。罗蒂和屈奇兰为哲学家描绘出的画像是:哲学至多只是合法的问题,但用不恰当的手段回答它们,因此受到拖累。而布洛尔看到的则是哲学家最大的特点:哲学只不过是加强了那些来自自然实在论的不良习惯。因此,鼓吹合理性和真理,不管说起来多么有理,其实是鼓励他们的自然倾向,似乎认为对他们最清楚的东西(makemost-sense)应该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最清楚的。

布洛尔并不认为合理性理论和文化帝国主义之间有某种必然的逻辑联系。他得出上述结论,是根据一个经验论题:以这样的合理性理论装备的研究者与无此装备的研究者相比,更有可能得到经验上恰当的理解知识如何运转。但是,“经验上恰当的理解”这个概念是否预设另一种特别的真理和合理性理论呢?可以设想,布洛尔和多数STS学究一样持约定论的态度,把答案推给某些行动,在一个相关的寻求知识的共同体(它提供知识社会学的模型)中,这些行动显示了“经验上恰当的理解”。布洛尔的强纲领是打破了传统哲学的自我形象。可以说,以下推理也代表了布洛尔的自然主义的特点。(1)哲学引导我们选取科学作为最高的研究形式,促使我们发展真理、合理性理论,这种理论迫使我们用严格的逻辑推理标准来辩护我们的知识,这又进一步揭示了我們自以为是(take for granted)的思想习惯的不恰当性。(2)但是,一旦我们开始作科学,我们发现这些哲学理论是进一步研究的障碍,因为它们鼓励我们以很少几处知识片断为根据,急急忙忙得到关于整体的结论。这个走向不成熟的总体化的倾向产生于我们试图让理性做经验观察所做的事。(3)这说明,这种思想方式是要说服我们相信科学的价值,一旦我们被说服之后,这种思想方式本身并不对科学有所补益。事实上,这种思想方式甚至可能是一个障碍,应该被搁置,因为它的用处已经用过了。

维特根斯坦把哲学比作梯子,一旦用过之后就要丢弃了。布洛尔的“反哲学”态度大都来自维特根斯坦,社会学家孔德、曼海姆也对布洛尔有一点影响。

布洛尔提出以自然主义方式取消哲学这门学科,这使哲学家们最为恼火。罗蒂和屈奇兰

认为哲学是认识实践的先锋 (precursor), 多数哲学家, 至少认识论者和科学哲学家, 认为这是正面的文化贡献。而布洛尔认为, 在科学占主导地位的认识文化中, 哲学是一种返祖现象 (atavism) 在哲学家与科学家的关系上, 虽然有的哲学家 (波普) 要求科学家更像哲学家, 有的 (屈奇兰) 要求哲学家更像科学家, 但哲学家一致认为他们自己最终是站在同科学家一边的。布洛尔否认这一点, 认为只有在科学不是占主导地位的认识实践的文化中, 哲学才是站在科学家一边的。

波普认为哲学家使科学家保持警觉, 周期性地 (反复地) 把他们从教条的、常规科学的沉睡中唤醒。而布洛尔认为, 哲学使科学浸染上一些习惯, 这些习惯使科学难以持久, 时间一长就做不了。例如, 伽利略信服推理的力量, 通过不断地进行推理, 伽利略揭示了亚里士多德的运动假定的人为性和不一致性。然而, 一个更好的物理学家是不会仅仅通过使用这些力量得来的, 因为这只会导致新的偏向被合法化, 成为“第一原理”, 如同笛卡尔的物理学。布洛尔断定, 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些经验上的第一原理, 如牛顿所说的, “从现象出发作推导”。科学最后总是要摆脱哲学的。这个说法显然认定科学与哲学只在某些场境中是相互相容的, 而另一些场境中则互不相容。科学与哲学有时形成暂时联盟反对共同的敌人, 如亚里士多德或基督教, 但一旦这个敌人被战胜, 科学占了支配地位, 科学的科学 (例如强纲领) 就会花很多时间清除科学中的哲学残余。布洛尔就是这样看他自己的计划的。

在叙述普利斯特利接近发现氧时, 布洛尔试图把真理概念中的麦粒与麦壳分离开来, 这个真理概念是说明普利斯特利做了什么, 没做什么所需要的。按照布洛尔, “普利斯特利的某某观念真, 某某观念假”等说法有完全合法的功能, 即把我们与普利斯特利共有的观念 (“真”观念) 和我们不与他共有的观念 (“假”观念) 区分开来。然而, 布洛尔认为, 如果我们输入一种更“哲学的”真理观念: 我们称为“真理”的那组观念比我们叫做“假”的信念更符合实在——独立于我们求知的利益 (interests), 那么我们的做法就是不合法的。把这种哲学的“累赘” (encumbrance) 包装进真理观念之中, 我们于是就能剥去普里斯特利的利益, 用我们自己的利益取而代之, 然后用适合于推进我们自己的利益的标准来判断他的工作。关于那些标准是什么, 我们处在完全同意的状态之中, 我们几乎不需要讨论它们, 因此它们对于我们不表现为利益。布洛尔从拉卡托斯那里得到启发, 把这种由现在的利益 (concern) 系统地代替过去的作法叫做“目的论”的合理性观点, 他认为这种观点常常被混同于关于理性如何在科学中起作用的真正的因果解释。

通观《知识和社会造型》, 布洛尔用来刻画关于真理和合理性的“哲学”观念的词汇如“意识形态”、“分裂” (divisive)、“高压”。“高压”一词来自杜克海姆 (Durkheim), 杜克海姆认为, 一个真理就是一个信念, 共同体根据这个信念迫使它的成员以某种方式行动。不论哪种情况, 哲学研究都是科学研究的包袱 (impediment)。实际上, 布洛尔试图作一个更强的论断, 这一论断在第四章 (关于波普-库恩之争) 讲得最清楚: 哲学把科学不必要地政治化 (philosophy politicizes science unnecessarily)。“我想提出的论断是: 除非我们对于知识的性质采取一种科学态度, 那么我们对这种性质的掌握不过是我们的意识形态的关心 (concern) 的一个射影罢了。我们的知识理论将随着相应的意识形态的兴衰而沉浮, 它们将缺乏任何自身的自主性或发展基础。认识论将成为一种纯粹的隐性宣传。”^⑧

现在, 库恩一般受到的指责是他用“革命”一词夸大了概念变化的不连续性。有趣的是,

布洛尔在更深的层次上指责库恩求助于“革命”，指责他以不同的手段给哲学即政治学的传统输液。布洛尔认为，波普和库恩为哲学家开了方便之门，使他们可以利用科学史，从中举出大量的例子表达他们喜爱的体制 (regime)。虽然《科学革命的结构》有一个可检验的科学变化的经验模型的形状，但它那使人兴奋的政治造型致使库恩、波普和其他一些对话人悄悄地溜出了自然主义，回到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世界。

布洛尔没有朴素地相信科学能够全部清除自身中的政治学。强纲领的一个最著名的实质性论题是，一切科学都是受利益驱使的。然而，承认科学中持续存在的利益并不等于必然要赞成这种利益的出现，因为有些利益可能腐蚀社会学家对科学的理解。这个方面，许多哲学家有意无意地误解布洛尔。布洛尔攻击哲学对科学的不良影响，他同后期维特根斯坦一样，把哲学看做一种独特的“生活形式”，认为科学家的实践是一种以历史为根据的自身整体 (historically based integrity of their own)。当然，实践科学家可以合法地改变科学实践。科学家对更大的社会的或自身利益的关心常常是他们的研究活动的一个因素，但这个因素只有在它们实际上改进科学实践的时候才有益于科学实践。谁决定实践受到了帮助还是受到了损害？这是一个经验问题，是由一个具体共同体的科学家来解决，社会学家处在发现其结果的位置上。如果哲学使人相信起作用的利益对于研究具有特殊的先验意义，而多数实践科学家又没有认识到，那么哲学可能模糊社会学家和实践科学家的视野。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丧失了他们代表科学的力量，政治学取得了胜利，但这种胜利应该受到指责。

可以说，布洛尔是一个自然化的认识论者，他还是一个特别自身一致的自然主义者：宣布他已经以科学的方式确定了他自己的领域。哲学阻碍了科学的进步。

注 释：

- ① D. Bloor, *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 1976, 1991,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② R. Giere, *Explaining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8.
 - ③ Barry Barnes, "Natural Rationality: A neglected concep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976, 6.
 - ④ Jerry Fodor, "Methodological Solipsism Considered As a Research Strategy in cognitive Psychology, in *Representations*, MIT Press, 1981.
 - ⑤ B. Barnes, and D. Bloor, (1982), "Relativism, Rationalism,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in M. Hollis and S. Lukes (ed.) *Rationality and Relativism*, MIT Press. P. 34.
 - ⑥ A. Fine, *Unnatural Attitudes: Realist and Instrumentalist Attachment to Science*, 1986, 95.
 - ⑦ W. V. O. Quine, *Epistemology Naturalized*, in H. Kornblith (ed.) *Naturalizing Epistemology*, MIT Press, 1985.
- R. Giere, *Scientific Rationality as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89, 20
- S. Fuller,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its Discounts*, New York 1992
- ⑧ D. Bloor, 1991, P. 80. S. Fuller,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its Discounts*, New York 1992.

(责任编辑 严 真)